



No. C1999017

1999-8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三大趋势及其成因初探*

田晓文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国立发展研究中心)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经济差距究竟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其成因何在？这一问题近年来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决策部门的关注。本文首先从方法论入手展示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三大基本走向，然后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与市场体制全方位“挂钩”这一基本宏观经济环境出发探讨这三大趋势的成因。最后，提出关于今后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建议。

一. 地区经济差距主要趋势的测定

从方法论上讲，地区经济差距的测量可采用综合法（summary measures）和分组法（group measures），而且对这两种方法来说最重要的都是测定相对差距而不是绝对差距。¹ 这一点在学术界似乎已得到认可，不存在什么争议。然而，究竟采用什

* 此项研究是笔者于1998年末和1999年初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客座研究员时完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此项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工作条件，世界银行提供了研究资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国立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Ron Duncan 教授提供了具体指导，特此一并致以真诚的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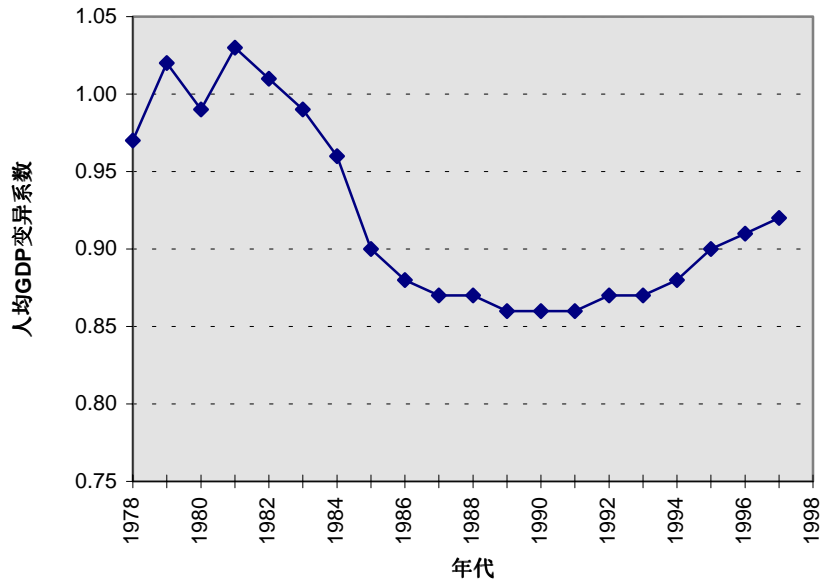
么指标来测量呢？这一问题却至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比如，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可利用的指标就有人均国民收入，人均社会总产值，人均 GDP，人均 GNP，人均农村居民纯收入，人均城镇居民总收入，人均消费水平，人均农业人口消费水平以及人均非农业人口消费水平等等。这些指标实际上可划分为两大类：产出指标（output）和生计指标（livelihood）。以上所列的人均国民收入，人均社会总产值，人均 GDP 和人均 GNP 归前者，其余均属于后者。在中国，这两类指标的变化趋向很可

能不一致。这一点尚未引起地区经济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实际上，人们对中国地区间经济差距变化方向所做出的不同判断，往往是由于所测量的经济指标不同而引起的。例如就改革开放后中国省际间经济差距变化方向而言，一些研究发现这种差距在扩大，而另一些研究则指出这种差距在缩小。这两种结论实际上都是正确的，但前提是首先要分清所测度的是生计指标还是产出指标。如果我们忽视这两类指标的区别而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动趋势做出结论的话，很容易出现片面性。

有鉴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主要变动趋势的分析将着眼于区分产出指标与生计指标。这里所测量的地区单位是中国的三十个省市自治区。我们用综合法测定省际间（相对）差距变动的一般趋势，而用分组法测定沿海省份与内地省份间（相对）差距变动的趋势。由于资料限制，1978至1985年间地区差距的计算没有包括海南和西藏。

图 1：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七年中国省际间产出指标相对差距（变异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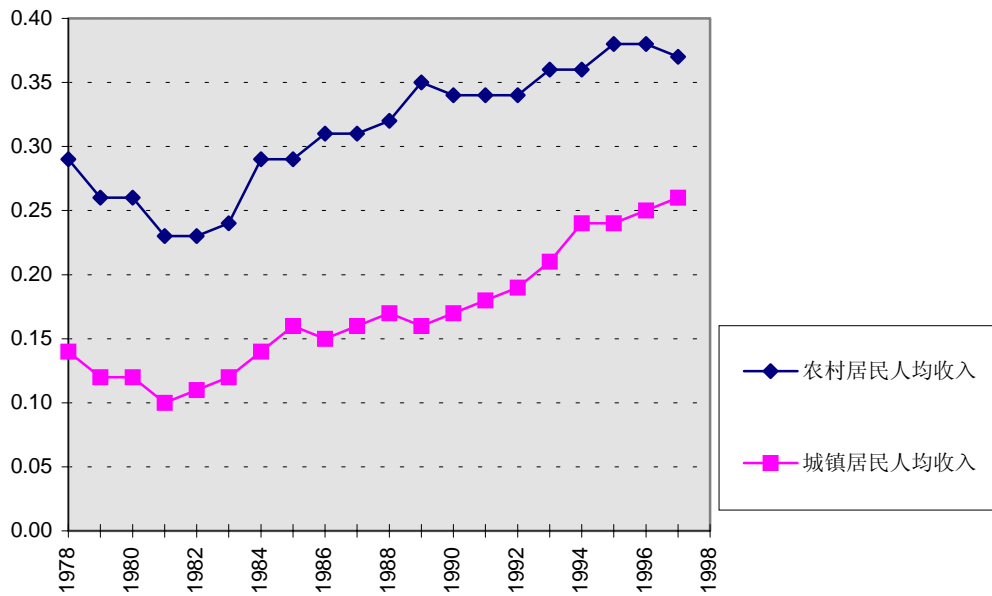
¹ 综合法测量所有地区单位间差距变化的平均趋势，分组法测定两组地区间差距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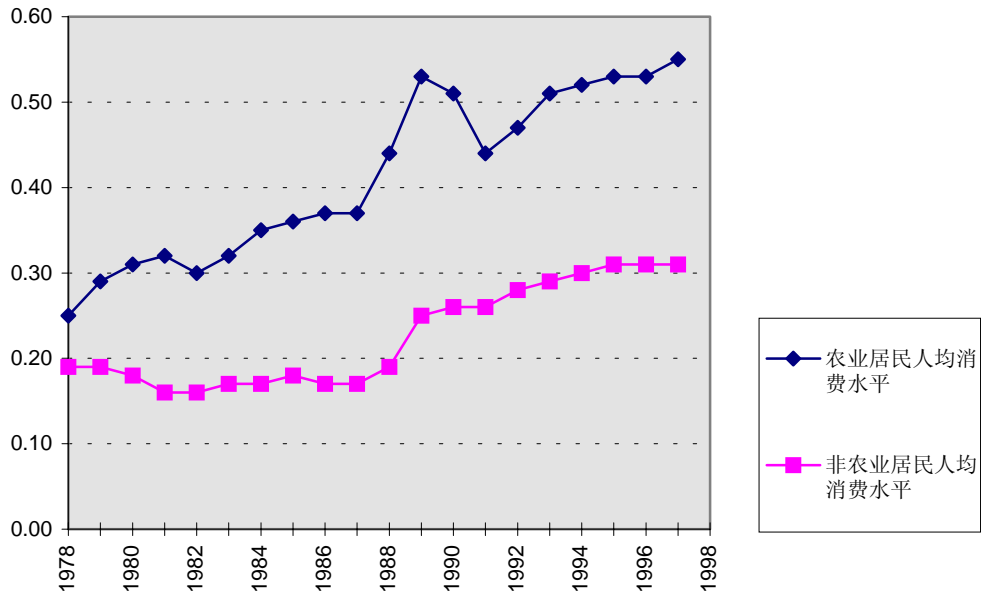


注释：所有资料都按一九七八年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3-1998；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历年统计年鉴。

图2：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七年中国省际间生计指标相对差距（变异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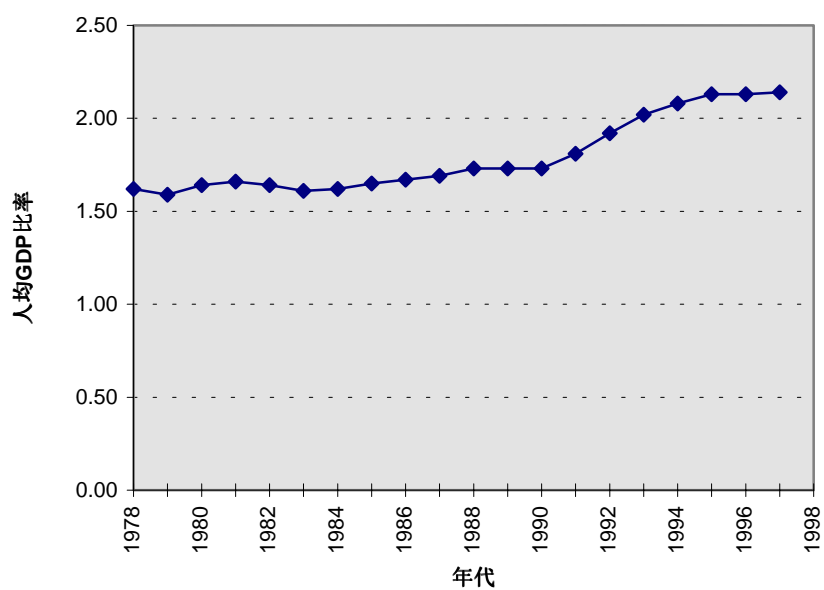


注释: 所有资料都按一九七八年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1983-1998;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历年统计年鉴。

图 1 和图 2 显示用综合法测定的1978年以来中国省际间产出指标相对差距和生计指标相对差距的变化。这里我们采用了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 是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相对综合差距测定法, 其所显示的省际间相对差距的变动方向与我们在这里用变异系数测定的大致相同 (Tian,1998)。图 3 和图 4 显示用分组法测定的1978年以来中国沿海与内地省份之间产出指标相对差距和生计指标相对差距的变化, 即沿海与内地两组省份人均产出指标之比率和人均生计指标之比率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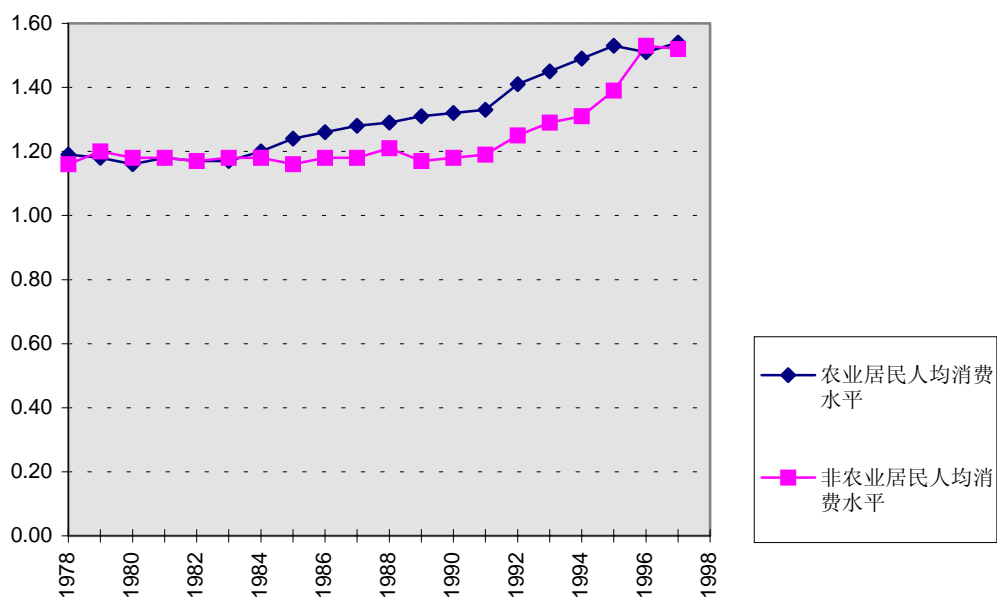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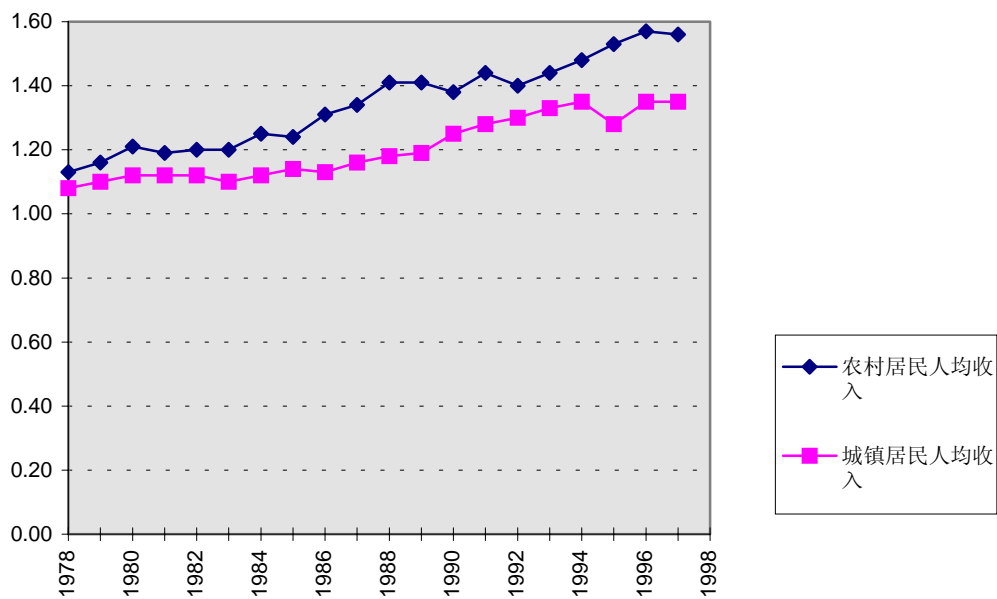
图 3：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七年中国沿海与内陆省份之间产出指标相对差距(比率)



注释： (1) 所有资料都按一九七八年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1983-1998;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历年统计年鉴。

图4：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七年中国沿海与内陆省份之间生计指标相对差距 (比率)



注释： 所有资料都按一九七八年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1983-1998;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历年统计年鉴。

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有三大基本走向：

- 省际间产出差距在缩小；
- 省际间生计差距在扩大；

- 沿海与内地省份之间的产出差距和生计差距都在扩大,尤其是东南沿海五小龙与内地省份之间的差距².

那么,这三大趋势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有许多.然而,探讨这一难题的关键是从我国在改革开放中与市场体制全方位"挂钩"这一大前提出发,从市场机制在这一时期的运作中寻找主要答案.从阐述方便起见,我们将地区间产出差距变化(包括省际间产出差距的缩小和沿海与内地间产出差距的扩大)的成因与地区间生计差距变化(包括省际间生计差距的扩大和沿海与内地间生计差距的扩大)的成因区分出来,分别加以分析.

二. 地区间产出差距变化的成因

地区间产出差距变化的实质在于地区间出现了非均衡的经济增长.一方面,省际间产出差距的缩小意味着:从总体上讲,起点低的落后省份经济增长快于起点高的先进省份.这一点在增长理论中往往用"落后优势"(backwardness advantage)来解释.也就是说,落后地区可以模仿和吸收先进地区发明的技术.由于模仿和吸收比发明容易且耗费少,落后地区很容易在技术上追赶先进地区,即所谓的"技术赶超"(technology catch-up).另一方面,沿海与内地省份之间产出差距的扩大意味着:从总体上讲,起点高的沿海先进省份经济增长快于起点低的内地落后省份.这一点可以用沿海省份在中国对外交流中的优越地理位置来解释,即"地理优势"(location advantage).

² 这与改革开放前不同.当时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三大趋势是:(1)省际间产出差距在扩大;(2)省际间生计差距在缩小;(3)沿海与内地间的产出差距在扩大,生计差距在缩小.关于那一时期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成因,我们(Duncan,R, Tian, XW,1999)已在他文做了探讨,在此不做赘述.

然而，从表 1 可以看出，一九七八年以来并非所有起点低的落后省份（如广西，山西和青海）的经济增长都快于起点高的先进省份，也非所有起点高的先进沿海省份（如天津，辽宁和河北）的经济增长都快于起点低的落后内地省份。这一事实表明，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影响着重“落后优势”和“地理优势”的发挥，从而决定着省际间产出差距的缩小和沿海与内地间产出差距的扩大。鉴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从以消灭商品贸易为宗旨的“脱钩”战略转向与市场体系全方位“挂钩”以提高效率的战略（Tian, 1996），笔者认为这一因素应该从各地区与国内外市场“挂钩”的差异或者各地区市场导向之差异中去寻找。

表 1：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速度与起点比较

排序	1952-1978				1978-1997			
	地区	1952年的 人均国民 收入(元)	地区	人均国民 收入增长 率(%)	地区	1978年的 人均GDP (元)	地区	人均GDP 增长率 (%)
1	上海	584.15	北京	7.30	上海	2483.97	广东	12.00
2	天津	261.96	上海	6.00	北京	1280.92	浙江	11.50
3	北京	250.80	天津	5.30	天津	1141.57	福建	10.80
4	黑龙江	207.92	辽宁	5.00	辽宁	666.47	山东	10.00
5	辽宁	193.58	陕西	4.50	黑龙江	553.59	江苏	9.92
6	新疆	157.20	青海	4.40	江苏	427.22	安徽	8.92
7	内蒙	149.58	山东	4.10	青海	425.75	新疆	8.73
8	吉林	142.87	江苏	3.80	吉林	381.43	河南	8.61
9	河北	109.47	河北	3.60	青海	364.78	河南	8.47
10	河北	104.23	河北	3.60	吉林	363.05	吉林	8.46
11	宁夏	103.26	浙江	3.50	广东	361.99	云南	8.37
12	江西	101.81	河南	3.50	山西	361.99	四川	8.36
13	浙江	95.29	云南	3.50	河北	348.88	四川	8.36
14	江苏	95.06	甘肃	3.40	宁夏	346.15	江西	8.30
15	福建	94.41	湖南	3.30	甘肃	330.06	河北	7.97
16	青海	93.43	四川	3.10	湖北	326.69	北京	7.80
17	甘肃	93.25	湖北	3.10	浙江	319.97	湖北	7.78
18	山西	88.13	湖北	3.00	山东	312.49	上海	7.70
19	山西	84.73	广东	2.80	山东	307.46	上海	7.68
20	广东	82.73	山西	2.70	新疆	292.55	内蒙古	7.61
21	山东	77.07	广西	2.60	内蒙古	284.54	广西	7.57
22	湖北	76.87	吉林	2.50	陕西	273.33	陕西	7.50
23	湖南	75.96	福建	2.30	湖南	270.59	甘肃	7.26
24	安徽	75.46	宁夏	2.20	江西	239.57	辽宁	7.12
25	河南	62.42	贵州	2.00	福建	237.21	贵州	7.09
26	陕西	61.35	黑龙江	2.00	安徽	230.54	天津	6.98
27	云南	57.31	黑龙江	1.90	四川	223.39	湖南	6.53
28	云南	54.77	内蒙古	1.70	四川	223.25	湖南	6.53
29	广西	..	江西	..	河南	223.25	宁夏	5.43
30	四川	..	新疆	..	河南	173.57	宁夏	5.03
	贵州	..	安徽	..	云南	..	山西	..
	海南	..	海南	..	广西	..	黑龙江	..
	西藏	..	西藏	..	贵州	..	青海	..
		海南	..	海南	..
		西藏	..	西藏	..

注释：(1) 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2) .. 表示无资料。

那么, 如何来验证这一理论假设呢? 由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 我们试用 "双向纯增量增长模型" 对之进行尝试性检验³. 该模型引入了国内和国际市场变量, 这样我们便可以采用一九七八年以来我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 "聚合数据" (panel data) 设计如下一个计量模型来验证: 各地区与国内外市场 "挂钩" 或市场导向的差异影响了 "落后优势" 和 "地理优势" 的发挥, 从而决定了这一时期省际间产出差距的缩小和沿海与内地间产出差距的扩大。

$$\ln\Delta Y_{it} = a + \beta_1 \ln Y_{0it} + \beta_2 De_{it} + \beta_3 \ln\Delta Dm_{it} + \beta_4 \ln\Delta Im_{it} + u_{it}$$

这里 a 表示 $\ln A$, Y 表示产出 (GDP). Y_0 表示这一时期起始年 (1978) 的人均 GDP, 旨在捕捉住 "落后优势" 的作用. De 是以沿海省份为一的虚拟变量 (dummy), 旨在捕捉住 "地理优势" 的作用. Dm 和 Im 用来捕捉住各省与国内和国外市场挂钩或市场导向差异的作用 (简称市场变量), 分别用各省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对外贸易总额来代理⁴. 检验的程序是先将 Y_0 和 De 放入回归方程, 估算其回归系数; 然后将 Dm 和 Im 放入回归方程, 看 Y_0 和 De 的系数发生什么变化. 如果市场变量对 "落后优势" 和 "地理优势" 具有重要影响的话, 最终的回归结果应是: 在引入 Dm 和 Im 后, Y_0 和 De 的系数值会大幅度变小甚至趋于零 (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2). 由于应变量和自变量中均有负值或零值, 而负值和零值无法取对数, 各地区的数据在时间跨度上便参差不齐. 故此, 我们无法采用科曼达 (Kmenta) 回归估计法, 而采用最小平方估计法 (OLS).

³. 关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 请参阅 Tian (1997).

⁴. 由于资料限制, 我们无法找到比此更好的指标来代理市场变量. 这种局限性在对社会经济现象的

表 2：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回归 1	回归 2
常数	7.32*** (10.5) [9.39]	3.15*** (8.79) [7.55]
1978年的人均GDP (Y_0)	-0.76*** (-6.31) [-5.5]	-0.31*** (-5.61) [-4.89]
沿海地区虚拟变量 (De)	1.14*** (7.99) [7.64]	-0.01 (-0.21) [-0.23]
国内市场变量 (Dm)		0.68*** (17.03) [11.63]
国际市场变量 (Im)		0.22*** (9.66) [6.61]
F 统计量	36.78***	577.96***
R^2	0.13	0.84
自由度	475	420

注释：系数下圆括号中的是 t 统计量，***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5。方括号中的是 White heteroscedasticity consistent t 统计量。

回归结果见表 2。竖栏 1 显示， Y_0 的系数为负值而且显著性水平很高。这表明“落后优势”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从而对这一时期省际间产出差距的缩小起了一定推进作用。也就是说，一般而言，一个地区的人均 GDP 低一个百分点，其 GDP 增量的增长率便会高出 0.76 个百分点。竖栏 1 还显示， De 的系数为正值而且

显著性水平也很高，这表明“地理优势”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从而对这一时期沿海与内地省份之间产出差距的扩大起了一定推进作用。也就是说，一般而言，沿海省份 GDP 增量的增长率比内地省份高出 213%⁵。然而，如竖栏 2 所示，在引入 Dm 和 Im 这两个市场变量之后， Y_0 的系数值减少了一半以上，而 De 的系数值则在统计意义上等于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控制市场变量的话，“落后优势”便得不到充分发挥，而“地理优势”则完全消失了。换言之，这一时期(一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之所以快于先进地区，(一些)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之所以快于内陆地区，主要是由于这些增长快的落后地区和沿海地区更加深入地推进了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开放，从而更加充分地与国内国际市场挂钩。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最快的东南沿海五小龙(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山东)。从表 1 中清楚可见，这五个地区起点大都相对较低，它们的高速增长起了缩小省际间产出差距的作用。同时，五小龙又都是沿海地区，它们的高速增长又扩大了沿海与内地省份间的产出差距。这一点与改革前不同，当时经济增长最快的是起点最高的沿海地区上海，北京，天津和辽宁，因而那一时期不仅沿海与内地的产出差距拉大，而且省际间的产出差距也扩大了。五小龙的兴起固然与中央给予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们比其他沿海地区更充分地利用了这些政策，更成功地进行了市场导向的改革，更全面地实现了与国内国际市场的挂钩(Tian, 1999)。

三. 地区间生计差距变化的成因

毫无疑问，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从根本上决定着各地区生计水平的提高。然而，我国地区间产出差距的变化与地区间生计差距的变化方向不一致这一事实，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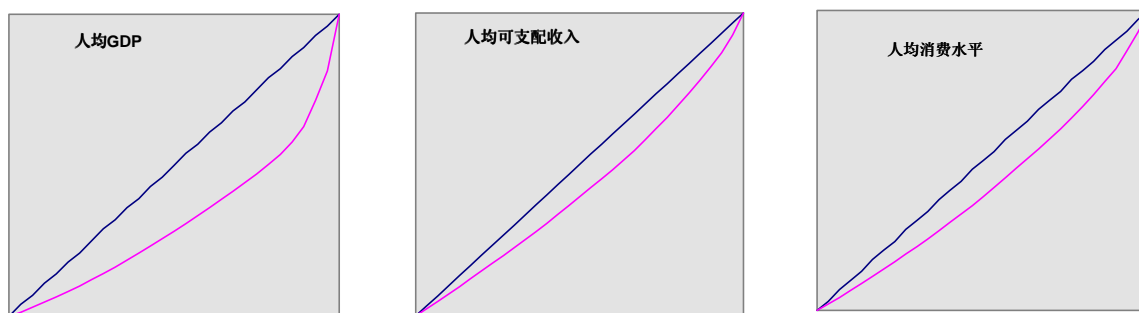
⁵ 1.14 的反对数是 3.13。3.13 减 1，得 2.13，即 213% (Halvorsen and Ralmquist, 1980)。

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地区生计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地区间生计差距的变化可能背离地区间产出差距的变化。在我国，政府对地区收入再分配的调控就是这样一种因素。因此在探讨我国这一时期省际间及沿海与内地间生计差距都在扩大之原因时，除考虑非均衡地区经济增长因素外，还要考虑政府对地区收入再分配的调控力量是否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削弱了。张曙光先生（1993）在这方面已做了开拓性探讨，我们根据新资料做进一步阐述。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保证各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大致平等，我国政府从经济发达且增长快的地区征收了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来分配给经济落后且增长慢的地区。上海，天津和辽宁这三个省市对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八年间其贡献额约占国家地区国民收入再分配总额的 62 % (表3)⁶。大多数落后地区，尤其是内陆的落后地区，是地区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最大收益者。所以，那一时期无论省际间的生计差距还是沿海与内陆省份间的生计差距都缩小了，尽管省际间和沿海与内陆省份间的产出差距都呈扩大趋势(Duncan,R, Tian, X.W, 1999)。因此，截止到一九七八年，用劳伦兹（Lorenz）曲线所测量的地区间生计不平等要比产出不平等小得多（图5）。

图5：一九七八年中国省际间产出指标和生计指标的劳伦兹曲线

⁶. 这种计算方法果然不尽如人意，但从中可窥见大体的趋向。



说明：人均支配收入根据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总收入估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3-1996;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历年统计年鉴。

改革开放后，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作用下，地区经济自治力日益增强，而政府对地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配力量则大大削弱了。如表 3 所示，政府所征收的用于再分配的地区国民收入总额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七八年间占全国国民收入的 11%，而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二年间仅占全国国民收入的 5%⁷。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减少，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 1978 年的 35% 降到 1995 年的 11%。政府用于补贴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开支（主要用于贫困地区）自然随之减少，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 1978 年的 4% 左右降到 1995 年的 0.7%。由此可以看出，地区间生计差距的扩大与政府对地区收入再分配调控力量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削弱有重要联系。正如世界银行（1997: 第 27 页）所指出：

" 中国的贫穷省份与富裕省份之间总是存在着收入差距。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收入转移体制，业已存在的基本不平等就会由于.....支出不平等而加剧。在现有体制下，财政收入很少由富裕省和县转移到贫困省和县。每一个地区都或多或少在财政上独立，公益开支取决于该地区所能征集的税收。结果，省际间人均消费差距在扩大 "。

表 3：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地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变化（亿元）

⁷. 我国从 1992 年起停止发表各地国民收入数据，故此我们的估算截止到 1992 年。

地区	1952-1978			1979-1992		
	流入	流出	净流入(+) 或 净流出(-)	流入	流出	净流入(+) 或 净流出(-)
北京	58.90	164.30	-105.40	297.46	119.06	178.40
天津	.00	381.00	-381.00	18.56	258.89	-240.33
河北	44.00	119.20	-75.20	.00	429.20	-429.20
山西	16.40	50.60	-34.20	144.19	27.61	116.58
内蒙古	61.30	58.80	2.50	438.38	.00	438.38
辽宁	.00	737.80	-737.80	.00	707.85	-707.85
吉林	22.70	47.00	-24.30	202.76	.00	202.76
黑龙江	.00	301.30	-301.30	.00	249.38	-249.38
上海	.00	1757.40	-1757.40	.00	1619.62	-1619.62
江苏	.00	321.70	-321.70	.00	924.23	-924.23
浙江	.00	89.90	-89.90	.00	361.00	-361.00
安徽	9.60	39.80	-30.20	44.72	42.00	2.72
福建	72.70	1.60	71.10	123.99	1.78	122.21
江西	65.10	13.30	51.80	153.85	1.20	152.65
广西	1.20	190.40	-189.20	.00	569.16	-569.16
海南	67.30	26.80	40.50	.00	188.85	-188.85
四川	65.60	95.20	-29.60	.00	329.80	-329.80
贵州	.00	132.20	-132.20	35.04	96.80	-61.76
云南	11.60	94.20	-82.60	63.50	374.94	-311.44
西藏	86.30	.20	86.10	190.57	.00	190.57
陕西	.00	.00	.00	73.11	.00	73.11
甘肃	191.60	10.50	181.10	197.38	9.48	187.90
宁夏	161.70	1.90	159.80	161.72	.00	161.72
青海	138.70	1.40	137.30	274.69	.00	274.69
新疆	.00	.00	.00	89.67	.00	89.67
	103.40	.60	102.80	504.98	.00	504.98
	74.40	23.60	50.80	205.82	12.30	193.52
	11.40	.00	11.40	198.53	.00	198.53
	30.00	.00	30.00	122.09	.00	122.09
	129.50	.10	129.40	548.81	.00	548.81

注释: 国民收入生产额减去国民收入实际使用额, 正值为流出, 负值为流入。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1983-1994;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历年统计年鉴。

具体而言, 两股地区性力量在市场竞争中独立性的增强对这一时期中央政府经济调控力的削弱和地区间生计差距的扩大起了重要作用。第一是以前的沿海 "老工业基地", 如上海, 天津和辽宁。这三省市至今仍属我国最发达地区, 但对我国地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贡献份额已从改革前的 62% 降到1992年的 41%。最为突出的是上海, 其贡献份额已从改革前的 38% 降到1992年的 26%。第二是这一时期的沿海 "新兴工业基地", 如东南沿海五小龙。尽管这些地区对国家地区收入再分配的贡献在这一时期显著增加, 但相对于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增速而言其贡献额仍很小。例如, 广东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而且也日益成为我国最发达的地区, 但是其对国家地区收入再分配的贡献额比一些经济落后得多而且增长慢得多的地区还要少。

表4：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九七年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指标（上海为100）

地区	人均 GDP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1978	1997	1978	1997	1978	1997
北京	51.57	50.22	80.09	66.20	74.62	91.79
天津	45.96	41.60	54.51	68.11	73.72	95.60
河北	14.57	15.16	40.61	59.74	56.36	64.44
山西	14.62	11.50	36.20	42.74	58.46	48.21
内蒙古	12.38	11.29	46.31	44.03	55.88	50.81
辽宁	26.83	23.06	65.91	62.20	70.04	55.13
吉林	15.36	15.81	64.72	57.40	56.44	51.39
黑龙江	22.29	14.26	61.15	53.30	69.00	45.50
上海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江苏	17.20	27.41	40.97	74.30	58.81	64.88
浙江	13.15	26.68	58.78	82.57	76.48	75.66
安徽	9.64	12.14	40.38	44.57	66.45	63.73
福建	10.89	18.89	49.00	66.82	69.32	62.89
江西	11.00	12.55	50.13	50.98	66.28	49.37
河南	12.88	18.31	40.81	63.43	73.76	75.84
湖北	9.28	10.99	37.41	47.29	73.29	61.42
湖南	13.29	14.28	39.37	49.12	67.35	52.19
广东	11.45	10.05	50.79	39.74	66.14	51.85
广西	14.69	27.54	62.85	74.17	68.39	92.56
海南	8.99	8.51	42.75	39.65	59.02	51.96
四川	..	20.39	..	32.05	..	52.08
贵州	9.55	13.41	45.28	36.48	66.58	51.27
云南	6.99	6.00	38.83	30.59	52.48	48.96
西藏	8.99	9.03	46.67	29.44	64.33	66.09
陕西	..	14.09	..	30.94	..	74.11
甘肃	11.78	10.41	47.74	27.75	59.22	46.42
青海	13.94	11.19	35.96	27.39	70.49	43.89
宁夏	17.14	10.03	42.40	33.01	67.18	47.64
新疆	14.05	11.02	41.33	36.05	65.43	44.98
	12.58	13.52	42.40	33.46	85.56	55.42

注释：(1) 按一九七八年不变价格计算；(2) .. 表示无资料。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3-1996；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历年统计年鉴。

由此不难理解，从中受“损失”最大的实际上是落后的内陆地区居民，尽管这种“损失”在某种意义上是市场导向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如表4所示，相对于全国最富的上海而言，大多数沿海省份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后提高了，而大多数内陆省份居民的生活水平则下降了。因此，这一时期不仅省际间的生计差距扩大了，而且沿海与内陆地区间的生计差距也趋于扩大。

四. 政策建议

以上关于一九七八年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差距三大趋势及其成因的探讨对我们预测今后地区经济差距的发展态势并制定相应的地区经济发展政策有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以沿海地区为突破口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是成功的。东南沿海五小龙的兴起不但对我国近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起了巨大作用，而且也缩小了省际间的产出差距。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五小龙到九十年代中期都已经跨入最发达的前十名省市行列⁸。由此可以预见，若国家不采取适当措施来扶植落后的内陆地区的话，不久不仅沿海与内地的产出差距的扩大趋势会加剧，而且省际间产出差距缩小的态势也会逆转而趋于扩大⁹。

第二，"落后优势"和"地理优势"固然重要，但是地区性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一个地区是否有效推进市场导向的改革，是否充分与国内国际市场挂钩。基于这一认识，国家对落后的内陆地区的扶植应更加侧重于政策扶植。国家应尽快把在沿海开放省份尤其是沿海经济特区所享有的优惠政策广泛推广到内陆省份，甚至可考虑对内地给予更优惠的政策，鼓励内陆省份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充分与国内外市场挂钩，利用市场机制促进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当然，内陆省份的地理特点和比较优势要给予考虑，适当的资金投入方面的帮助也是必要的。

第三，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地区间生计差距的扩大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以往绝对平均主义的一种反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过于扩大既是社会不安定的隐患，又不利于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对此，国家应采取适当税制改革措施力争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以确保对居民收入不均的宏观调控力量；但最关键的是，国家要采用上述政策扶植措施推动落后的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使这些地区的人民靠自己的力量富裕起来。

⁸.1978年，人均GDP排列前十名中有四个内陆省份。到1993年，五小龙的兴起已使沿海省市包揽了前十名。

⁹.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全国最发达的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经济增长明显加快，这就更增加了省际间产出差距缩小趋势逆转的可能性。这一点可从图1中窥见一斑。

参考文献

- Barro, R. J. and Sala-I-Martin, X. (1992). “Regional Growth and Migration: A Japan-United States Comparison”,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6, 312-346.
- Chen, J. and Fleisher, Belton M (1996).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2, 141-64.
- Duncan, R., and Tian, X.W. (1998). “China’s Inter-provincial Economic Disparities: 1952-1995”,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June 1999.
- Halvorsen, R. and Palmquist, R. (1980). “The Interpretation of Dummy Variables in Semilogarithmic Equ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3), p.474-5.
- Tian, Xiaowen. (1996) “China’s Open Door Policy i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XVII, No.1, pp.75-95.
- (1997) “An Endogenous Model for China’s Growth Since 1978”, in C.A. Tisdell, e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ition*.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 (1998)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in an Opening Economy: China since 1978*,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 (1999) “The Rise of Five Dragons in Southeast Coastal China”, processing.
- World Bank (1997)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World Bank.
- 张曙光, 1993, 李军 魏耀焱 魏斌恢 魏德汀保 *经济研究*, 第9期, 第19—26页.
- 田晓文, 1997. “双向纯增量模型: 以新的理论估计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研究*, 第11期, 第51—63页.

